

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解与把握

李媛媛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包括坚持“两个结合”等。坚持“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大理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彰显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植根于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自觉自信。从文明传承视角来看，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奋起的命运转折。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注重从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这些探索为守护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积累了丰富经验、带来了重要启示。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华民族遭遇了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面临文化主体性丧失的重大风险，不得不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中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的传统文。中国共产党是在中西文明激荡的时代条件下走上历史舞台的。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境，各种思想流派、各种制度模式、各方政治势力轮番登台，但都未走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二元对立的误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提供了用科学态度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系统方法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开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方面进行改造，并发掘其中蕴含的积极价值理念，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里的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体现了我们党立足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文明创造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破解了近代以来聚讼纷纭的“古今中西之争”。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两者相互作用、相互赋能。提出“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和增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也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

揭示走出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无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不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就无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逻辑。面向中国实际问题，我们党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and 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深厚的文化土壤，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制度创新。

从理论层面看，我们党始终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守正创新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例如，在方法论上，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这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就有体现。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矛盾论》生动阐释了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规律。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又如，在认识上，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种实践品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思想相契合，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中亦有体现。这些方法论、认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价值层面看，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大地并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相融通的。例如，中华民族在西周时期就已形成政不离德的德治传统，此后儒家推崇民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这些政治观念被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吸收和继承，并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相结合，在国家建设、政党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又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其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寄托着相同的美好愿景。

从制度层面看，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智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创新完善。例如，中国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历史事实和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及民族理论相融通，决定了中国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而是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顺应并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贡献

“第二个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坚持“第二个结合”，我们不仅能够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新的荣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为解决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全新方案。

为世界各国提供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西式现代化塑造了近代世界的基本格局、经济体系和发展路径，但其是建立在对外殖民掠夺、对内剥削人民的原始积累基础上的，局限与弊端日益凸显。进入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改变了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事实证明，不同文明的历史

传统和发展道路存在着深刻差异，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独具特色、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不仅以非断裂性、非依附性的模式实现了自身文明形态的延续、迭代与创新，也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探索文明复兴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推动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幻交织，面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破解和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亟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大同”“大智治制”等理想理念，这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具有同样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格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四大全球倡议等，发起成立丝路基金、亚投行等，以实际行动向世界持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全球治理的理念转变与规则创新，为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作出了中国贡献。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洞察时代大势，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守正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奋进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主体性与开放性、原则性与灵活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2026年“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科学规划促发展》，着眼“十五五”时期国内外发展形势，结合人们的思想实际和理论关切，深入回答了如何理解五年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10个重大理论和实践热点问题。该书在理论阐释上坚持学理性和普及性相统一，注重从学术基础、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维度等方面着力开展解读，说理透彻、文风鲜活，实现了“言洁”“辞弘”“旨永”三个维度的高度统一，是一部让读者能够看得进、读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精品佳作。

“言洁”体现为语言表达简洁有力、直抵人心。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相当丰富的内容，是理论工作者应当具备的能力和素养。《科学规划促发展》坚持要言不烦、字字珠玑，内容表达文约而事丰，体现出言简意深的理论风格。比如，在探讨“传统产业的突围蝶变之路”时，该书正视部分人对传统产业的刻板印象与认知偏差，活用短语对仗等方法，简洁有力地提出了“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活法，落后的从来不是产业本身，而是附着其上的旧观念、旧管理”这一启智破局的观点，有助于读者打破固有认知、廓清思想迷雾。又如，在阐释“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辩证关系时，该书摒弃长篇累牍的说理，善用生活化表达，深入浅出地道出二者的内在关联，“做优增量好比‘开源’，把新挣来的‘活水’用在刀刃上；盘活存量好比‘挖潜’，把家中闲置的资源重新盘活用起来”，既通俗形象，又意蕴明晰，让读者易于理解、乐于接受。

“辞弘”体现为文字内容意境广阔、格局宏大。理论阐释要有“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要有大视野、大胸怀。《科学规划促发展》坚持以察大局的宏阔眼界、观长远的战略思维，展现出宽广深邃的理论视野。比如，在论述“以大历史观看规划”时，该书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在回望中让读者看到规划的思想，不仅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古已有之，而且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践而行之，更在共和国成长的历史上一以贯之，进而使读者对“‘中国式长期主义’既有‘谋定而后动’的古老智慧，也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历史规律的主动把握，让宏伟蓝图落地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成就”这一合规律性的真实结论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又如，在论述“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焕发新光彩”时，该书从世界大势的广镜头，揭示出“文明优越论”进一步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隔阂与紧张的同时，又表明我国在尊重“各美其美”的多元差异下，在投身“美美与共”的文明互动中，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新时代中国形象。

“旨永”体现为文章主旨意味深长、价值永恒。有理想、有抱负的理论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科学规划促发展》坚持以理论的主动把握历史的主动，以思想的力量激荡奋进的力量，彰显出思接千载的理论追求。比如，在分析“‘十五五’的‘时’与‘势’”时，该书通过“从大国博弈看格局之变”“从安全风险看秩序之困”“从科技竞争看动能之变”“从国内发展看转型之坎”这4个方面展开探讨，既讲清当前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又给予读者要在“危”中见“机”、在“变”中求“进”的启示。又如，在回答“未来五年的战略考量”时，该书用“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要以强大国内市场为战略依托”“要在共同富裕的坐标系中校准方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进行了准确概括和响亮回答，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明晰“十五五”规划中各项战略任务与重大举措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指向，学着弄通做实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

总之，《科学规划促发展》在理论阐释上坚持以“言洁”为基础，以“辞弘”为升华，以“旨永”为方向。认真研读此书，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加自觉地把握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进而在把握发展大势中找准自身定位，在应对风险挑战中锤炼过硬本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

（作者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读

科学规划促发展

宋 驰

有感

筑牢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法治基石

朱 磊 郭林青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对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作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确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碳市场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重大意义，准确理解其在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有关要求，进而积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意义重大

生态环境法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释放信号、展示决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不会减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会停歇”。近年来，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在气候治理领域，美国“开倒车”、欧盟“踩刹车”，全球气候治理遭遇逆风。但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势不可逆转。在这一大背景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并设置“应对气候变化”专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我国坚

持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一贯立场和坚定决心，彰显了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中国作出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宣示以来，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探索出一条发展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但部分地方、企业应对应对气候变化、碳市场建设等工作存在不同认识，推进的节奏和力度差异较大。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从碎片化管理向系统治理的历史性转变，以立法明晰方向、稳定预期，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全国碳市场建设作出相关规定，进一步凝聚共识，强化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保障。

健全制度、筑牢根基。全国碳市场建设启动以来，主要依托中央文件、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推进工作。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进一步完善了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顶层设计，提供了基本法律遵循。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重点环节的基本制度，细化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同时为持续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留出了适度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加快形成上下贯通、系统完备的碳市场法治体系，保障碳市场健康持续运行。

促进碳市场建设走深走实

2021年7月和2024年1月，我国先后启动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激励社会自主减排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两个市场共同构

成全国碳市场体系。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超过9.3亿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核证自愿减排量累计成交量超1700万吨。近年来，全国碳市场建设统筹把握节奏和力度，服务“双碳”目标实现的市场功能逐步显现，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促进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填补了碳市场领域长期缺乏上位法的空白，以法治化促进碳市场建设走深走实。

一是明晰监管职责。生态环境法典构建起多方合力、协调统一、系统治理的新格局，明确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年度碳排放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并组织实施。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的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核查，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二是压实主体责任。生态环境法典要求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开展温室气体统计核算，编制温室气体年度排放报告，按照规定的期限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并对排放统计核算数据、年度排放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三是增强刚性约束。生态环境法典贯彻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要求，规定对未报送排放统计核算数据、年度排放报告或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处罚，为全国碳市场提供法治保障。2026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颁布，对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在内的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确保相关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

推动全面有效贯彻实施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时期，也是全国碳市场快速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以更大力度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需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持续完善全国碳市场法治基础。要准确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主旨要义和精神内涵，做好相关的普法宣传工作。同时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专门立法工作，推动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核心内容纳入立法框架，持续开展相关立法问题研究，逐步构建以生态环境法典加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的双法源格局。

充分发挥全国碳市场功能。积极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作为实现碳排放双控目标的有力举措，将国家降碳目标分解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的行业企业，切实压实企业降碳责任。统筹考虑产业发展阶段、减排成本和减排潜力等因素，科学设定配额总量，做好与产业、经济、金融、贸易等政策协同，推动全国碳市场的功能从低成本降碳向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低碳技术创新等多维度延伸。

有效激发全国碳市场活力。进一步完善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稳健推进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探索与碳排放权核证自愿减排量相关的碳质押、碳回购等碳金融创新，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努力实现碳排放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作者分别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研究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